

清诗史

严迪昌著



上

I207.209
Y045



郑州大学 *040102265040*



浙江古籍出版社

【上】

清诗史

严迪昌 著



I 207.209
Y 045

Qat69/63

弁 言

十七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爱新觉罗氏王朝统治时期的清代诗歌绵延近二百七十年，这一时期既是中国古代诗歌流变史程上不应轻忽、不能或缺的集大成阶段，又是新旧诗风、诗心因革嬗变的关键时期。清代诗歌更是特定文化时空里“三千灵鬼”历劫多难的心灵搏动之最见具体深微的抒情载体遗存。毋论就中国诗史抑或文学史、文化史，乃至“士”之心灵史而言，一代清诗的认识价值、审美意义以及文献参酌、补苴功能，均值得今人投入学术心力，予以深入研究。

本书以四编二十四章并绪论三章的篇幅，着重以人文生态与心态之审视，辨析清诗发展过程中诸种诗风、诗群之构成以及诗人们各自的流变分合与历史地位；运用“诗文化学”批评方法，关注并契入科举文化、隐逸文化、地域文化、家族文化诸基因，以认辨清代诗歌繁富复杂的诸多特定现象。意在通过“史”的全景式梳理整合，揭示清代诗歌贯串始终的“朝”、“野”离立之势，并与晚明诗史与人们通常认定的“近代”诗史相贯联观照，以显现“因”、“变”承续的轨迹。

各篇论述“遗民诗”、“江东三家”以及诸如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赵执信、沈德潜、袁枚、黄景仁等世称

大诗人时，力求不囿陈说，逐一剖析不相重复的文化构成及个体性独异现象，置于“史”的宏观参照下详加微观论辨。至于对历来为人们忽略轻慢已久的诗人，则谋持一己学力所及特多论列，几近三百家，以图为有清一代诗歌首次作一较全面的整合。

跳脱传习偏嗜之见与模式框架，从上千部诗别集与有关史料探溯流变，厘清脉络，还置数百诗人于应占的历史位置，概以特定史实为据，无蹈人云亦云之弊，是笔者所心期。唯学殖荒陋，心力难济，疏漏必多，误解亦复不免，祈盼方家、读者教正。

严迪昌

2002年3月于吴门

目 录

上 册

绪论之一 清诗的价值和认识的克服·····	1
绪论之二 清诗的嬗变特点——“朝”、“野”离立之势·····	16
绪论之三 黑暗的王朝与迷乱的诗坛——晚明诗史述论·····	32
第一编 风云激荡中的心灵历程(上) 遗民诗界	
引言·····	61
第一章 宁镇·淮扬遗民诗群·····	67
第一节 白门遗老·····	70
第二节 “徐州二遗民”与“望社”诗群·····	103
第三节 吴嘉纪与维扬、京口遗民诗群·兼论 “布衣诗”·····	134
第二章 以方文、钱秉镫为代表的皖江遗民诗人 ——兼说地域文化世族·····	180
第一节 真气淋漓的方文的诗·附说方氏族群·····	185
第二节 钱秉镫及其他·····	199
第三章 喋血于山岭海涯的两浙遗民诗群·····	209
第一节 浙东遗民诗群·····	212
第二节 浙西遗民诗群·····	235
第四章 顾炎武与吴中、秦晋遗民诗人网络 ——兼说遗民诗僧·····	260
第一节 吴中遗民诗人网络·····	260

第二节	遗民诗界南北网络的沟通人——顾炎武论·····	292
第三节	傅山及秦晋诗群·附论河朔诗群·····	304
第五章	“交广从来是楚乡”——湘粤遗民诗界·····	320
第一节	鹄泣猿啼不胜悲的王夫之·····	322
第二节	慷慨任气屈大均·····	329
第三节	遗民诗界殿军陈恭尹·····	338
第二编 风云激荡中的心灵历程(下) 清初诗坛		
引言	·····	351
第一章	江东三大家·····	354
第一节	钱谦益与龚鼎孳·····	354
第二节	吴伟业及“娄东诗群”·····	375
第二章	“绝世风流润太平”的王士禛·····	421
第一节	诗界“开国宗臣”的认识意义·····	421
第二节	时代与个人双向选择中的王士禛·····	425
第三节	王士禛主盟诗界的时间考辨·····	449
第四节	“神韵说”形成过程与审美内涵·····	456
第五节	王士禛的诗歌创作成就·····	473
第六节	“王门弟子”论略·····	482
第三章	朱彝尊的诗及其诗学观·····	498
第一节	朱彝尊的诗歌生涯和诗学观·····	499
第二节	朱彝尊的诗歌成就·····	514
第四章	“南施北宋”和开府江南的宋荦·····	523
第一节	悲怆沉慨的宋琬诗·····	524
第二节	清醇老苍的施闰章诗·····	531
第三节	宋荦述说·附邵长蘅与“江左十五子”·····	538
第五章	查慎行论·····	556
第一节	“浙派”辨·····	556

第二节	查慎行诗文化心态的构成·····	559
第三节	《敬业堂诗集》的诗史意义·····	569
第四节	查慎行的诗歌风格辨·····	590
第五节	附说吴之振·····	594
第六章	赵执信论·····	600
第一节	齐鲁与江南诗文化的消长以及赵执信 的时代契机·····	600
第二节	赵执信诗学观形成过程及其诗界 “权在匹夫”之争的时间考辨·····	605
第三节	赵执信“越轶山左门庭”的诗学观·····	623
第四节	赵执信诗创作成就·····	638

下 册

第三编	“升平盛世”的哀乐心声：清中叶朝野诗坛·····	651
引言	（附“文字狱案表”、“乾嘉诗坛达官行年表”、 “分类表”）·····	651
第一章	耆儒晚遇的沈德潜·····	668
第一节	沈德潜的诗歌生涯及其“时世”契机·····	670
第二节	叶燮《原诗》与沈德潜“格调说”异同辨·····	677
第三节	沈德潜的诗·“吴中七子”·毕沅·曾燠·····	692
第二章	翁方纲及其“肌理说”·····	708
第一节	“肌理说”的文化机制（附说“试帖诗”）·····	708
第二节	翁方纲的诗学观及其诗作·····	715
第三节	附论——从李文藻、桂馥到阮元·····	723
第三章	袁枚论·····	731
第一节	“袁枚现象”的诗史意义·····	731

第二节	“袁枚现象”的文化内涵及其构成过程 · 附表四种·····	740
第三节	袁枚文化意识对名教纲常的叛离性·····	762
第四节	袁枚的诗史贡献·····	776
第五节	袁枚诗的成就·····	807
第四章	乾嘉诗人谱(上)·····	819
第一节	屈复·····	821
第二节	画人诗举要·····	824
第三节	“一卷怪石”胡天游·····	837
第五章	八旗诗人史略·····	844
第一节	“辽东三老”、“三布衣”举要·····	848
第二节	宗室诗人中的“篱外寒花”群·····	858
第三节	铁保与法式善·····	865
第六章	乾嘉时期地域诗派诗群巡视·····	872
第一节	以厉鹗为代表的“浙派”·····	872
第二节	钱载与“秀水派”·····	889
第三节	高密诗派述略·····	904
第四节	岭南诗群·····	910
第五节	洪亮吉与常州诗群述略·····	923
第七章	乾嘉诗人谱(下)·····	930
第一节	赵翼的诗史观及其创作成就·····	931
第二节	蒋士铨的诗及其与袁枚的关系·····	938
第三节	王文治、李调元述略·····	942
第四节	“性灵”后劲张问陶·····	945
第八章	黄仲则论·····	954
第一节	凄怆的心魂·····	955
第二节	《两当轩诗》的认识意义·····	957

第三节 《两当轩诗》的审美特征·····	967
第四节 黄仲则诗文化渊源辨·····	972
第四编 风雨飘摇时的苍茫心态——晚近诗潮 ·····	980
引言·····	980
第一章 昏沉时世中的悲怆诗群·····	985
第一节 王昙的“杀花”之哭·····	986
第二节 孙原湘的“自救”诗心·····	989
第三节 “郁怒”的舒位《瓶水斋诗》·····	992
第四节 郭麐的诗风及其诗学观·兼辨姚鼐的 “桐城诗法”·····	998
第五节 彭兆荪的幽愤诗情·····	1009
第二章 “一箫一剑平生意”的龚自珍·····	1014
第一节 龚自珍的诗史地位·兼说“清代诗史” 与“近代诗歌”的叠合关系·····	1014
第二节 龚自珍诗的“箫心剑气”及其以“完”论诗··	1019
第三节 附论汤鹏与魏源·····	1027
第三章 鸦片战争时期的忧愤心史·····	1033
第一节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及张际亮、朱琦 等的爱国诗篇·····	1033
第二节 贝青乔的《半行庵诗存》和《咄咄吟》·····	1041
第三节 从姚燮到张维屏·····	1046
第四章 太平天国时期的幽苦诗心·····	1053
第一节 进退失据的心灵——陆嵩、李映棻诗例说·····	1053
第二节 郑珍的离乱心歌·····	1058
第三节 金和的“秋螭”之唱·····	1063
第四节 江湜的“风兰”心音·····	1067
第五章 结篇 诗史帘幕的双向垂落——“同光体”	

与“诗界革命”	1074
重要参考书目	1081
后记	1099

绪论之一 清诗的价值和认识的克服

有清一代二百七十年间的诗歌，以其绚烂丰硕的盛貌，焕发着作为中国古代诗史集大成的总结时期所特有的风采。清代诗歌卓具的深广的认识意义和丰富的审美价值，雄辩地说明古典抒情文体中这一最称主要的形式，仍在持续地发挥其遒劲的功能作用。它的生气活力的高扬未衰，适足以表证：以五七言古近体为文本形态的诗的生新机制依然十分强健。

所以，清诗应该有其自成体系的学科建设，它有理由拥有自己的颇具规模的学术队伍。

然而，尽管近十年来学界对清诗的认识有所推进，但从整体看，该领域的开掘和研究是滞缓的。无论其涉及的广度抑是深度，均与中国诗史的这一不可或缺的组合部分极不相称。

清诗研究所以滞缓的原因很多，例如：这本属一项面广量大的系统工程，但迄今尚无一部汇辑整合的总集，因而连清人诗究竟有多少，几乎谁也说不出来比较准确的数字。至于数以万计的诗人的行年、心迹以至他们具体创作实践的氛围背景，由于陌生伴随缺略俱来，于是讹误和舛乱丛生。面对浩似烟海的研探领域，诚非少数有心人在有限岁月里得能窥见全豹、把握总体的。可是，倘若不去尽可能地对清代诗人及其作品进行一番梳理和整体审视，

仅仅依据前人的选本或诗话来品评描述一代清诗，那末势必又将导致虽似化解了陌生感，却转而陷入种种门户纷争和艺术偏嗜所织就的理障。中介精芜杂错，焉能借以探骊得珠？由此而言，这里既需要队伍，更需要时间和足够的前期准备，以期获得较为完备的整体认识，并不断清理去诸种偏见和偏嗜，从而勾勒或寻绎出清诗演化的史程来。

在缕述阻滞清诗研究的诸多原因，特别是关涉理障成见时，不难发现，长期起着很大阻滞作用的要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①的提法。

由于这一观念的不断地被推崇和延伸，简单化地从纵向发展上割断某一文体沿革因变的持续性，又在横向网络中无视同一时代各类文学样式之间的不可替代性，终于导致原本丰富多采、无与伦比的中国文学史变成一部若干断代文体史的异体凑合缝接之著。于是，秦汉以下无文，三唐之后无诗，两宋以还无词云云，被引为权威性定论。因此，即使某些中近古文学史专著，虽也偶及唐宋之后的诗文词，无非只是聊作陪衬，略予点缀而已。

当然我们没有理由反对对某种文体在特定时代所呈现的辉煌成就加以褒扬和强调，因为那是客观存在的史实。问题是如果这种褒崇被强化到割裂历史、支解整体的地步时，则必然会导向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误区。在文学研究领域内架构任何定于“一尊”的格局都是非科学的，其本身不符合文学发展的史程实际。可是这一观念的影响却是如此深远，清诗的长期遭轻忽，诗史上这一特定阶段的研究的荒疏冷寂，不能不说其致命的原因之一在于此。

事实上，无论就文学的功能性还是文体持续发展的整体性而言，清诗所别具的价值都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文学的功能性，集中起来看必然首先归结到其对特定时空的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表现力上。这种表现当然是或直接或间接的，

而且，毫无疑问乃是透过作家们各自切实具体的感受而后的艺术折射以出。作家诗人们笔底的任何哀乐悲欢，均导之于他们对现实人生的体察辨味，他们的心绪情思的涟漪波澜，实即生活于其间的社会众生相和人格化了的自然环境在心魂深处激起的回应。因而凡是赞颂、抨击，愉悦、悲怨、哀生、悼逝等等，莫不是他们对现实生活所独擅的是非、美丑的评判形态。

唯其如此，任何文学文体的功能性不仅不会一次性完迄，而且一次性造成阻断前景视野的障蔽性峰岭现象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作为认识和表现对象，也就是由人的群体组构而成的社会生活固然是持续不间断地在运动推进；而推促社会发展的人（包括作家诗人群）本身也同样地在这种运动中不断完善着自己。人的智能、人对客观环境的认知和把握力，无疑是处于愈益提高和增强过程中，人的情感体验度更是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愈见灵敏和深细、丰富。前者是承续的积累，后者则是演进中的深化。尤须注意的是，基于这样的积累和深化，人对自身作为主体的个性精神的执著追求必然愈趋强烈，意识更明晰。封建的历史行程又严酷地证明，以皇权为标志的庞大的统治网络以及统治者的王霸措施，均未游离于整体社会的运动轨道之外，而是恰恰也在共时演进。封建统治愈趋入后期，其网密法酷，其阴柔和暴虐心性亦远超前代。于是统治与被统治、官与民、朝与野、人与非人之间的扼制与反扼制的冲突，毋庸置疑地随着时空的推迁而益显得尖锐激烈。

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是随人在积累和深化过程中同向递进的，人是文化的创造主体。文学既是人学，那么，处于文化高层面上的文学范畴中，诗堪称文化精神的高远氤氲形态。作为人的心灵波段的文化载体，诗在表现社会尖锐激烈的冲突时，其功能正与时空推进成同步。

当对文学的包括诗的功能略作寻绎及辨认后，就不难发现：诗人所表现的“我”，以及其所表现的自身生存于其中的那个时空里的社会生活现实，必皆是嬗变中的人和现实。因此，文学表现的不可重复和不可替代性应是文学研究的一个不容背弃的论旨和应该恪守的原则，尤其是断代文学文体史学者应有的共识。是的，视文学创作为自家心灵寄托的诗人作家们，他们“这一个”的生活体验、情感触发各有独异之处，有着固有的不可移易性。所以，凡独立的作家均有客观存在的合理性，而卓特的成就非凡的作家尤非异代同行所能取代之。文学功能之所以不衰，从深层看，其实仰赖于他们的贡献良多。

由此而言，今天人们要认识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的统治历史，要认识和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要认识和探讨活动于封建末世的各色人物，特别是认识和探觅知识阶层的核心实体“士”的精神状态、心灵底蕴，除却史乘文献外，还得借助于这近三百年间留存的文学成果。就文学范畴讲，单靠小说或戏曲的研究想把握大文化背景前的一代人事演变，显然是远难企及的。这不仅仅从一般意义上说各类文体的不可替代，重要的还在于“乃心声”的诗在历经千百年的发展后，已广泛普及地为封建文人所掌握。承续明代，清代诗人在思想、学术、审美诸方面综合智能的全方位高涨既是空前的，那么这种高深度的文化教养体现于诗创作时，不单是强化了反映生活、表现情思的直接简捷性，强化了与现实社会倏忽多变的相适应力，而且在抒情功能的充分发挥上也愈显得轻灵敏捷和细微深入。因而清代诗歌的多侧面多层次的灵跃视野，从宏观到微观无不提供着宏富的认识参照系。

所以，虚悬一个“唐诗”或“宋诗”的标杆来绳衡清诗，乃是削足适履之举。至于以之来贬抑一代清诗的价值，更属对事物

“因”、“变”规律的悖背。今天的文学史家没有理由步随前人再去踩“宗唐祧宋”之类的泥淖。

只要不存偏见，清诗在表现特定时代的功能性上无愧于前代诗史的事实应是不难考见的。有清一代社会动荡，风云多变，几乎贯串始终，即使号称“康乾盛世”的历史时期亦不例外。这确是一个迥异于前朝前代的封建王朝，举凡封建历史上曾有过的各式惨酷、阴柔、颀顽、诡谲的统治行为和手段，无不集大成地在这二百七十年间遍经施行，并且多有发展，别具特性。当然，从历史际遇来看，这末世王朝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也每多前朝前代所未曾经遇的。举清代史事之要，大略有：明清易代之际民族冲突和阶级矛盾的尖锐激化及交相杂糅；战火频仍，民众固是水深火热，士子们亦或彷徨失依或进退维谷，顺治一朝为稳固爱新觉罗皇族政权而迭兴“通海”、“科场”、“奏销”三大案狱，于是一种前所少有的旧巢覆破、新枝难栖的惶惑、惊悸、幻灭、失落之感，伴随愤激、悲慨、哀伤、寒苦等心绪，缠绕紧裹着南北各层面的知识之士，从而更变着相对稳定于明代中叶以来的文化族群结构。康、雍、乾三朝的文网高张，空前的株连杀戮，进一步威劫着几代文化人的心灵，“士”的生气活力被深深地戕伤，从而生发出别一种华夏文化的氛围，考据之学应运而盛兴。紧接着嘉、道之际的衰颓之势而来的，则是以鸦片战争开其端的真正的外敌人侮；继之又是远较前此的白莲教等起义猛烈的太平天国燃遍山河的烽火。这些事件从不同层面严酷震撼着全社会，憬悟或惊醒了大批封建文人中的有识之士，预兆并肇启了华夏民族历史的新的兴变更替。

清代历史的演化有其特定的走向，而清代的诗歌在表现这历史行迹时所发挥的功能是卓特的，相副其使命的。即使某些层面上形若隔代，考其实绝不能作简单类比。

例如满族统治集团挥八旗铁骑入关，君临中华，依传统观念视之，此乃又一次以“夷”治夏，颇似金、元之灭两宋。然而，相似原非重复，清王朝入主关内后所施行的一系列恩威兼加、宽猛相济的手段，以及调动和利用满汉集团矛盾，并于以满制汉的同时又广泛运用以汉制汉策略，显然远较元蒙统治者及“后金”的先祖高明。而历经明代发展并变易了的儒教理学之熏陶，加之明朝中叶开始振兴的城市经济生活的教养，明清易代之际几辈文化人士的心态和素养也迥异于南宋之末的士人。至若自明末趋于极盛的兼政治与学术为一体的结社活动所产生的深广紧密的社会群体网络，其影响力也非短时期内能击散，于是在清初各个文化层面上所展现的复杂景象，更为前代史实中罕见。所以，甲申（1644）、乙酉（1645）之际和往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胜国”遗老和抗清志士们所抒露的情怀，已非南宋末年忠贞之士所能比拟。以诗人言，顾炎武、阎尔梅、钱秉镫、屈大均等的诗以纪史、诗以述怀的艺术造诣固非南宋遗民诗人们所能企及；吴嘉纪、方文、邢昉以及冷士崐等一大批“布衣诗人”的心歌，也远胜宋末江湖诗群中的任何一家。如果说“遗民”诗群多少还可寻绎出某些类比之点的话，那么鸦片战争的外夷入侮，亡国之危迫在眉睫时触发的心声堪称史无前例。面临“亡天下”之势，顾炎武当年所昌言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论，作为整体性民族精神，从此普遍激发于诗人们的歌吟中。一团灼热的赤诚心气凝结在诗的王国，谱成了中华诗史上最称瑰丽之一章，精诚延绵，直至于现当代。至于太平天国战争威力之宏肆，烽烟迅猛四披，更不是黄巢以至李自成揭竿之举可并论。天国烽火自粤西燃起后，经两湖沿江东下，打击主要在东南，这对封建末世王朝基石的撼动，对封建秩序的破坏是致命的。其对文化领域荡涤也空前酷烈，它既惊恐、悻怖着各层面的文化人，又在这氛围中激活起他们对自身生

存的思考。这种心态深层变化具有不容轻忽的历史意义，是中国文化史、“士”的心迹演变史、思想史的极为重要的稽考命题。此一时期的诗人大多际遇不幸之甚，他们辗转在剧烈震荡的生死波谷间吟唱不绝，是又一种“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史诗心音，从而为上述稽考提供着丰富的史实。

不仅如此，于号称“承平”之世而偏多悲凉之歌，又是清诗所拥有的无可取代的认识价值，或隐晦，或畅朗，或激越，或冷峻，吟哦着与“盛世”极不谐调的心曲，这在康熙一朝以至自诩为“十全王朝”的乾隆六十年中代不乏人。此中既有被庙堂势力抛弃而转以“匹夫”自任的赵执信一类诗人，又有以黄景仁为典型代表的寒士诗群，更有隶属“八旗”世胄的马长海、李锴之属。这是一批夜笛横吹的歌手，程度不等又风格各异地组构成为清代特有的在“野”的诗文化群，从而与朝阙庙堂诗群适形成离立之势。关于清代诗史上严重弥漫着贵族化的御用气、缙绅气之雾霾以及以“一尊”制约诗坛的背景史实，下文将专节予以介绍。这里只是指出，草野诗文化群的不绝如缕地呈现，正是特定时代的情绪激射现象，是时代陶铸了一批诗史英才和文化精华。其所具有的认识意义，事实上已不止于诗的范围，对考察诸如曹雪芹这样的文化巨子的出现，正有着重要的助证和参照价值。须知历史上的戏剧或小说家并非专司其事者，无论名于世还是淹没于史的作手，莫不备擅于诗文，且精工非同凡常。把原本多才兼能的文化巨擘分割成一个个枯燥贫乏的似乎只会编剧本或讲故事的人，实在唐突了古之才人，也不可能说清楚何以会有如此高妙造诣。

以上简略例举，诚不足以概见整个清代诗歌的功能价值。但管窥蠡测，当已可表证清诗有其非前代诗歌或别种文体所能包孕和替代的深广内涵。清诗，有它自具的生气和命脉。

然而，文学研究并非历史研究的补充，更不该是后者的附庸。